

# 我所知道的延安中央党校

陈 模

我 1936年 4月参加革命，1938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我在重庆工作，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南方局得知这个情况后，为了保护我，让我化装成党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吴奚如的秘书，搭乘他们撤退的卡车前往延安。我们沿途还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在克服重重困难后，终于在 1941年 3月 3日下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我们住在中组部的招待所里。三天后，中组部同志与我谈话，分配我到中央党校学习。

## 难忘的学习生活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间是 1941年 3月到同年 12月。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为邓发，广东人，工人运动领袖，领导过省港大罢工；教务处主任是刘芝明，他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是社会科学家，我读过他主编的《社

会科学基础读本》；组教科是杨英杰，40岁左右，学识丰富，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讲授《列宁主义问题》。他讲得头头是道，深入浅出。教研室有四人：吕振羽、王学文、齐燕铭、陈伯达。他们不全讲课，有时打出讲义散发。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吕振羽有一次来我们班参加讨论会，侃侃而谈，出口成章；王学文研究政治经济学，一天傍晚，我问散步的王学文先生说：“听说，您在上海见过鲁迅。”他说，是的，接着就给我讲了鲁迅先生在上海的生活和创作，如数家珍；齐燕铭研究文艺路线；陈伯达是后来的，当时以为他了不起，善于阐述毛泽东思想，后来才知道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王稼祥。

当时我被编在 52班。我们班中高级干部、知识分子较多：有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领袖；有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不仅有学问，而且说起话来有文采，俨然是成熟的知识分子了。此

外还有几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如一位河南王老汉，60岁上下，长着半尺长的白胡子，领导过河南农民起义；还有一位老红军团长，井冈山下来的，打仗时必光膀子，神勇无比，跟随贺老总多年，是长征中的英雄、抗日名将。我们一般是上午听课，下午讨论、自习。课程有《列宁主义问题》（杨英杰讲）、《中国近代革命史》（龚释夫讲）、时事政治（李忠敏讲）、党的建设（马江讲）、文艺斗争（刘芝明讲）。讲课的人都有专业知识，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讲得具体、深入浅出。我感觉最让人开窍的还是听大报告，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周扬和杨献珍等人的讲话。我在党校学习、工作期间，前后听过毛泽东十多次报告。他学识渊博，年富力强，也很能讲。他讲得最多的是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还有1944年秋王震率部队南下时，毛泽东向南下支队干部的讲话等。我曾听周恩来讲两次，一次讲西安事变经过，一次讲抗日战争形势面面观。他的口才极好，讲得深刻动人。张闻天是大知识分子、学者，给我们讲待人接物，朴素中见真理。陈云虽不是学者，但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七年练习生，人极聪明，斗争经验丰富，爱思考，讲话清晰、幽默、有趣，让

我们受益良多。周扬、杨献珍都是学者型讲话。陈伯达著作多，但不擅长讲话，他的闽腔很多人都听不懂。

按规定，听报告后，都要在小组或班会上讨论消化。在讨论中没有规定，学员可以自由发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经历不多，大多听老红军、地下党组织的老同志讲。也有一些年岁较大的人，讲国民党如何腐败、军阀们怎样带兵打仗，讲三教九流、行帮黑社会，我们也很爱听。

1941年9月，中央决定由彭真担任中央党校教育长。不久，他和夫人张洁清一起搬到南山头上一座石砌窑洞小院内。彭真是我党在北方区最老的党员之一。他1923年由高君宇、李毓棠介绍入党，曾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领导天津、河北工作最长，还做过工运、兵运工作。1941年，彭真奉命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晋察冀边区的建立及其政策。原来，大革命失败以后，平山、阜平农村埋伏下一支农军，藏枪几十杆，七七抗战后，就靠这点人，发展到几千人，在——五师聂荣臻领导下建立了30多个县政权，部队扩大了几万人，成为华北最大、最强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他们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三三制”政权，办抗大，办党校，大量训练干部。毛泽东听后格外高兴，称赞他们的开拓精神，说：“你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搞活了。”并让彭真向中直机关、中央军委、边区系统

干部普遍报告一次，前后共作了30多场报告，历时两个月。彭真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入狱六年。他在监狱中坚持读马列主义原著，由于他认真学习，因而进步很大。彭真抓党校教育有两大特点：一是重视理论教育，他亲自讲哲学、思想方法，还请博古、凯丰、胡乔木、艾思奇、何思敬等理论家讲课；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请富有斗争经验的薄一波、高岗、黄敬、朱瑞、王从吾、舒同等地区领导人讲建党、建军和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的经验，扩大了学员们的视野，使他们增长了本领，因而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那时延安中央党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能够丰衣足食，并没有多少困难。当时学员80%以上都是住窑洞，我住在党校北山头一排窑洞的第一个窑洞，洞高一丈多，长两丈多。洞末打了一防空洞，贯连了所有的窑洞，洞前临窗靠墙有一长炕，能睡十几个人。夏天很凉爽，冬天烧炕，很暖和，还能防敌机轰炸。文具每人每月发纸10张，墨水5钱，铅笔2支（或毛笔每两月一支）。《解放日报》每个窑洞一份，清油灯每人一个（煤油灯两人一个）。伙食方面，党校的高级班——地委与军队旅以上干部，吃中灶，中午、晚上有一荤一素一汤。我们中级班干部吃大灶，主食是小米饭或馒头，一菜一汤。

## 延安中央党校的改组和调整

为了适应全党整风的需要，使中央党校能够担负起组织领导全校整风学习的任务，党校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和调整。

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其中指出：“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首次明确了中央党校的培养对象，并规定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担任指导。文化水平太低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

同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校的领导工作。委员有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

年底，经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等人商定，由彭真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党校计划》，并经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计划共16条，规定中央党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同时，对学员的入学条件、生活待遇、学校的组织机构，也都作了具体规定和安排。

当时，彭真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说，应

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底，中央党校学员自己动手兴建的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党校的校训。这四个大字涂了红色，上方是鲁艺美术理论教师、雕塑家王朝闻雕塑的毛泽东侧像，显得庄严、美观、大方。

从1941年底开始，一批批高级干部陆续来到中央党校，经入学考试，据其文化程度高低，分别编入高级班正科和高级班预科。预科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几个支部，约300余人。每个支部都配有文化教员，讲授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在整个学习期间从未间断。为加强文化学习的领导，1942年秋，成立了文教委员会，其职责为：研究贯彻校部制定的关于对工农老干部教学文化的方针，选编教材，组织教学，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齐燕铭任主任。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对中央党校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新决定》规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领导。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邓发主持教务会议；彭真仍为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原来的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即行取消。

同时还规定，党校停止过去规定的课程，在1942年内学习党的路线；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合并到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以300人至400人为限，参加党校的学习，其名单由中央组织部协同总政组织部、西北局组织部共同审定，同时并审定中级学习组名单；党校出版《学习报》，由彭真负责，陆定一副之；关于党校增加校舍及经费问题，由李富春解决。

3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正常进行。如对中央直属系统及外来之地方党政民干部、军委直属系统及外来之军事干部、边区系统之干部等如何审查政治条件等均作出了具体规定，而且还规定，“所有介绍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或入正科或入预科，统由中央党校按其政治文化水平决定之。”我记得，有一次，彭真与黄火青、杨献珍在开完某个会后谈到培养干部时，彭真说毛主席特别重视培养高级干部，在中国，能真正培养200个高级干部，中国革命就成功了。他还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很有水平，他认为看一个干部最重要的是有两个素质：一是对党无限忠诚；二是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标准有四条（即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独立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遵守党的纪律），



1945年9月8日日寇投降后，中央党校教务部七位同志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为陈模

比列宁的干部六条标准、陈云的干部五条标准都高明。

此时，我已经从中央党校毕业，留校在中央党校秘书处、教务处工作。秋末的一个傍晚，我走过教务处的一排窑洞门口，彭真笑嘻嘻地叫住我：“小陈，来坐一坐，谈一谈嘛！”他问我来党校多久了，工作称心不称心，还问了我的学历和简历。大概是由于我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思想比较单纯，字写得还可以，不几天，组织上正式通知我搬进彭真院的小平房去住，给他当行政秘书。

1943年，抗日战争局面更加艰难。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大力培训中高级干部，3月20

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将中央党校划归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并决定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兼教育长，黄火青任秘书长兼总支书记。毛泽东这一校长职务，一直延续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延安中央党校停办。毛泽东亲任校长，旨在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路线之争，以开展两条路线的学习和整风运动。

1943年春夏间，中央党校的组织机构再次进行调整。1942年2月中央党校改组后，学员分为一部和二部。原中央党校学员中的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组成党校一部，同时军事学院的高级

班也合并到一部，一部主任原为黄火青，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后由古大存继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后为教务副主任）。二部学员为原中央党校学员中的地方中级干部（县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以及新入学的中级干部，下设 17 个支部，张鼎丞任部主任，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由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扩大培训党的干部，中央党校又办起了四个分校，即三、四、五、六部。1943 年 5 月 4 日，原来的马列学院，改为中央党校三部，三部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或文化理论工作者，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阎达开；同时，将中央党校学员中需要补习文化知识的工农老干部集中起来，组建了四部，既学文化知识，又学革命理论，部主任为张启龙（后为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1944 年 2 月，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将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五部。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10 月以后，原西北局党校二区学员划出，成立中央党校六部。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这六个部下面又编若干个支部。

这个时期，中央党校由原来的

1000 多人，发展到学员 3000 余人、工作人员 3000 余人（包括从前方回来的干部所带的警卫员、勤务员等），这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学工人员人数最多的时期，再加上附属的农场、菜园和校办工厂的职工及其家属，已超过 1 万人了。此时中央党校的学员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当时全国各个战略区的党的负责人，大批党的高中级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有个统计，出席大会的代表 544 人，候补代表 208 人，共 752 人。其中有中央党校一部学员 237 人，其他各部学员 100 人，党校工作人员及虽已分配工作但尚住在党校的 64 人，共计 401 人。中央党校出席七大的代表占七大代表 53%。从这一统计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央党校在中国共产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它不仅训练教育了数以万计的中高级干部，而且在进行党史、路线教育，特别是三年整风运动中，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政治觉悟，批判了党内的“左”倾与右倾错误，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端正了党风和文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 1945 年 4 月召开的党的七大做了思想准备，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做了准备，为扩大解放区、建立新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高级干部。

## 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

1942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党的整风运动。2月1日，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下午两点多钟，毛泽东坐着汽车来了。他身穿灰色棉军衣，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大礼堂，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彭真致词后，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著名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深刻阐释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宗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并强调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的报告赢得了与会者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一场伟大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4月，我们中央党校教务处党支部的同志，一边学习整风文件，一边议论，觉得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也反对党八股，非常重要。为了让学习“有的放矢”，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我们就想请徐特立徐老给我们讲一讲党史。当时不久前徐老在文化沟

的青年讲座上讲“人生之路”，讲得好，很受青年欢迎。大家推选我去请他。我去自然科学学院见他，他一头白发，穿着朴素，讲话时笑呵呵的，像个老农民。他得知我的来意后，一口答应，说：明天上午9点我来，你们不要再来，我自己骑马去。

第二天上午9点，我们教务处支部的同志集合在俱乐部里，听徐老讲话，秘书处和校务部也来了不少人，总计有几十人。徐老在热烈的掌声中，站着以浓厚的湘音给我们讲了党的历史上曾犯过的路线错误，也讲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我问：“徐老，毛主席是你的学生？”徐老笑道：“他是我的学生不假。你们也知道这句成语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是个天才，他早胜于我喽！”他的一席讲话，谦逊而睿智，又使我们对他增加了几分敬意。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1942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兼任中央总学委主任，副主任是康生，彭真任委员。

当时中央党校有六个部，学员职工有1万多人，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各方面需要解决和分清的问题，有利于全面地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因而自然是整风运动的主要阵地。整风运动这一全党范围的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思想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以延安中央党校为重点展开



1943年落成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墙上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实事求是”

的；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央党校的学员和工作人员，一律参加整风学习，不同之处在于：学员全力以赴，工作人员在业余时间学习。

为了配合这场运动，中央党校出版了八开小报《整风通讯》，我担任编辑，每隔几天出版一期，指导全校的整风运动。同时，为了加强对全校整风学习的领导，中央党校还有意识地吸收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参加党支部的工作，直接领导基层的整风学习。

当时我所在的党校教务处，下设两个党支部，一个是组教科支部，大部分是教师、干部；另一个是秘书科、干部科支部，担负秘书、油印

室、图书馆、干部、档案等工作，分三个小组，共2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既有老红军、归国华侨，也有中学教师、知识青年。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是党的发起者、建党元老何叔衡烈士的女儿何实嗣。她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长期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她的处境艰险。她的爱人杜绍友是中央机关秘密印刷所负责人。我听她讲过他们如何应对敌特宪兵追踪，如何几天吃不上一顿好饭。

第一个阶段是学习整风22个文件。我们每人发一册《整风文件》约20万字。主要有毛泽东著《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刘少奇



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季米特洛夫的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性、调查研究以及领导方法的三个决定。大家都把这些文章视为经典，逐篇、逐段地读，读七八遍的不在少数，一边读，一边进行小组漫谈、讨论，讨论后还作笔记。学习过程中也允许自己找材料，看其他的书。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当时规定中央党校各级领导人都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毛泽东亲自阅读了一些学员的读书笔记，帮助改正错别字，有的还加上按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

第二个阶段是理论联系实际阶段，对个人的历史、思想进行检查。可是，究竟怎样联系实际，怎样把文件吃透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这个关键时刻，5月14日，彭真在《解放日报》上以社论形式发表署名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实质》，指出整风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分析与解决问题，树立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领会贯通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他的这篇文章，对整风运动中如何学习22个文件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中央党校校刊《学习通讯》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一时间，全校出现了《改造》、《矢与的》、《思想解放》等十

多种壁报，以沟口布告栏、俱乐部附近贴得最多，放学时来看的学员络绎不绝，大家兴高采烈，收益颇大。

各支部涌现了不少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教务处于是组织了四场“典型发言”，在大食堂举行，学员、工作人员都参加了。

我记得一个30岁出头的红军旅长的发言，听他的口音是湖南人。他说，我打起仗来，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敢冲敢拼，打了一些胜仗。可是，敌情复杂，敌人诡计多端，我听不进政委的意见，也不理会参谋长和一些营连长的好主意，光知道“正面佯攻，两面包抄”，中了敌人的埋伏，部队损失很大。师部批评我骄傲自负，把我撤职。我在红大学习了一个时期，才知道我犯了不知彼、不知我、盲目作战、主观主义的错误。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几十个好同志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是我对不起他们呀！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全场沉寂，人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这几场“典型报告”，对全校的自我检查、“洗心革面”，起了非同小可的示范作用。

接着就转入第三阶段，即审查干部阶段。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

计，如一开始就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受康生极左思想的影响，扩大了敌情，把自己队伍的纯洁性估计得太低了。中央党校随即转入审查干部阶段。

按照党组织的规定，每人要先写一份历史自传。内容主要有怎样划定自己的家庭成分，怎样划分自己的历史阶段，对个人历史上的问题怎么写。党支部、老同志对此作了解释，都强调一点：一个党员对党要绝对忠诚，“事无不可对党言”，要以竹筒倒豆子的精神，毫无保留地讲出来。霎时间，山头上、校园里、窑洞中，到处是两三个人或一组人在交谈。供销社的稿纸、有光纸都脱销了。能写的干部写历史自传，少则两三万字，多的达七八万字。不擅长写作的工农干部则请知识分子帮助写。我用一周的业余时间，写了份1万多字的历史自传，还花费不少时间，帮几个老红军把自传写了出来。

历史自传写好后，我们先在党的小组会讲一次（一般为半天），然后讨论、质疑、回答，大家提出意见修改后，再到支部大会上讨论。

我们支部有三四个工农干部，他们出身很苦，属于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吃过资本家的苦头，挨过地主土豪的打骂，历史比较单纯，在党小组上讲一讲，大家再提意见，有两三个晚上就通过了。我和几个小青年，从小上学、受过国难教育，积极参加

抗日救亡斗争，由党组织送到延安学习，历史轮廓也清清楚楚，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都有证明人。我们都在支部大会上讲，从提意见到通过，一般都要六七个下午和晚上。我在讲了自传后，大家给我提了不少问题：你对抗日积极，到底有多少共产主义觉悟？你为家乡受苦难的人报仇，有没有想到阶级的解放？你是否考虑过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等等，证明我有抗日、为民族谋独立、解放的觉悟，但阶级觉悟太少了。

感到为难的是几位年长一点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同志。当时规定，如有自首、叛变行为，主动交代了，有历史证明，自首后表现又好的，可以继续当党员；当过叛徒交代后，仍开除党籍，可以做党的“朋友”；如果顽固不化，又不交代，组织上掌握了确凿的调查材料，可以送党的社会部审查处理。那时我们的科长，当过河南某中学的教师，也组织过抗日宣传队，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过；还有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大学生，挺有学问的。那个阶段，他们整日愁眉苦脸，食不甘味，夜晚也总是在窑洞前呆坐或在山坡上走来走去。后来，科长在学校教务处领导同志的帮助下，向党交了心。原来，他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取保释放，填写了“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的“保证书”。组织上认为他是“半

自首”，有危害党的行为，保留党籍，只作为历史问题存档。那位大学生，原来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属于地主阶级，他入党填志愿书时写成“富裕中农”，自己写个检讨，更正出身成分，也就作罢。他们二人交心后，同志们和他们紧紧握手，欢迎他们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在个人自传讨论中，原晋察冀北岳区的一位县农会干部交代，在一次边区反“扫荡”战斗中，他只扔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两个日本鬼子，报功时却说扔了三枚手榴弹，炸死了四个日本鬼子。他为自己向组织撒谎感到难过。另一位老红军坦白说，他在家里常打老婆，没有啥道理就打人，打的是受苦的阶级姐妹。

7月15日，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搬用苏联“肃反”极左的一套，肆意扩大敌情，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在十几天中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了一批党的好干部。例如，在我们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河南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危拱之、王志杰、郭晓棠，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的“红旗党”，还牵涉到他们领导的许多地、县干部。邹凤平是四川省共产党的优秀代表，连任省委书记多年，功勋卓著。他曾经五次被敌人逮捕，由于他与旧军阀有私交，屡得出

狱。康生怀疑他是叛徒，他不堪逼供侮辱，饮恨自尽，震动全校。我们孩子剧团在延安有11人，有不少被怀疑成“国民党分子”。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生气地说：“这些小孩子有什么问题，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嘛！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第三厅的人，抵制参加国民党，孩子剧团抵制参加三青团。他们什么也没有参加。”他在另一次会上说，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国民党各个特务系统的特务加在一起，不到3000人，在延安一个地方就打出好几千特务，完全是错误的！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康生的错误，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对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中央党校也做了甄别工作。所有冤假错案材料，我都复写上报给毛泽东。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1944年5月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他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

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由于毛泽东为在审干运动中受委屈的同志，在多个场合赔礼道歉，同时党组织又作了许多工作，受冤屈的同志的气也渐渐地消了。

## 关于党的历史 和党的路线的学习讨论

1943年10月，在整风的基础上，党的高级干部开始系统地回顾、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在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当时各地区分散，许多省区党委又处在战争环境中，只能以省区党委为中心扩大一部分高级干部参加，延安成了执行这一任务的基地。延安又以中央党校为中心，这里不仅高干多，还有七大代表，有时举行报告会、讨论会，中直、军直、边直的高干们也来参加。这次回顾、学习党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彭真也投入了不少精力。

彭真根据中央的指示，把党的七大代表和党校高级班学员，集中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他利用党校各种集会来讲路线斗争的大课，列举了我党历史上的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以

大量事实和典型事例证明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

这一段路线斗争学习进行了将近一年时间。学习开始时，发给每人一本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有砖头那样大、厚的书），后来又发了一本厚书《两条路线》。这两部历史文献是我党自六大以来党的文献的汇编。当时学习讨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大会、支部会、小组会、全部辩论会、全校辩论会、出墙报等。部一级的民主大会采取自由报名、自由发言的方式，没有发言稿，也不要领导审批发言内容，大会也不设记录。对于讨论中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高度集中，把思想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大家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都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认识到，党在年轻时、在长期的奋斗中，不可能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总结和汲取。党中央的早期领导人犯过右倾错误，但后来主要是“左”倾错误。历史证明，毛泽东在建党建军上有重大功绩。他的思想路线正确，从实际出发。例如，在大革命失败后，

红军力量还小，尽管当时中央负责人主张打长沙、赣州等城市，毛泽东不赞成，上了井冈山，发动农民，壮大红军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敌军派10万、20万、30万部队进攻，他也不主张硬拼硬打，有可能就集中兵力，吃掉它一路，没有可能就隐蔽起来，保存红军力量，等待时机。

在中央党校学员深入研讨党史和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胡乔木为改好这个决议，多次来到党校，召开座谈会或按地区找人谈话，征求大家对《决议》草稿的意见，听取意见修改后，又来征求对定稿的意见。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胜利地召开党的七大奠定了思想基础。

##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既是培养干部的教育场所，也是保存干部、人才的基地。校内各级领导，都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骨干。有些从前线回来的干部还需要养伤治病，恢复健康。中央要求妥善解决好这几千人的衣食住行。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那时，中央直属机关设管理局，主管中央机关职工生活与生产事宜，方仲如任局长。中央党校也归他们管。校内设校务部，主管教职员工的

生活和生产活动，部长为牟泽衍。牟泽衍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师级供给部长，是在四川通南巴地区参加红军的，富有生产供给经验。他是店员出身，有经济头脑，熟悉市场与供给这一套业务，大家称他是中央党校的“总管家”。他当时年过半百，又矮又瘦，特别能吃苦，从早上睁眼起床，一直忙到后半夜一两点，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抓得很细，事必躬亲，点子多，办法活。

由于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围困陕甘宁边，边区生产力水平低，来延安的干部、学员、家属过多，造成供给上很大的困难，缺吃、缺穿、缺日用品。1943年1月，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牟泽衍成了党校的指挥员。他在南泥湾设立了农场，平时种田，冬天烧木炭，供全校学员、职工冬春取暖。在延安设了蔬菜大队（大多由地委、旅级以上学员的警卫员、勤务员组成），派黄立德任大队长，种了几百亩菜园，保证全校四季吃的蔬菜，黄立德干得好，被选为劳动英雄，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牟泽衍还设立了养猪场，从几十头发展到几百头。还办了运输大队（高干学员入了校，所骑的马匹交由学校组成）、庞大的校办工厂，能生产纸烟、服装、文具、农具，能修理铁器、茶缸、脸盆、牙刷（包括以旧换新）。日寇在晋察冀边区大“扫荡”时，应牟泽衍的要



中央党校的菜园

求，彭真从边区农村撤出五六百名女青年，办了服装厂。这些女青年既学习文化，又学参加各工厂劳动。她们之中不少人逐渐与许多老红军学员结了婚。

中央党校在每个部都设了生产科，有自己的菜园和猪场，保证蔬菜和猪肉自给。我记得，党校有几位国统区建筑学院毕业的高级工程师，校部聘请他们设计、领导施工、建设了大礼堂、校部三位领导人住的石窟，还建设了俱乐部、校内公园、延水桥、校部大伙房、大车队马棚、海燕卷烟厂、校办服装厂、石印印刷厂，至于各部食堂、厨房、职工宿舍、幼儿园房舍，那就不在话下了。

当时，中央党校学员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党校根据各

部学员的具体情况，给他们规定了不同的任务。一部和四部的高级干部，资格老，年纪大，每人每年给公家交50斤南瓜、5把扫帚。二部学员人数多，年纪轻，校部给他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年交100斤小米、50斤马草。五部的学员每人每年要上交5斗粮食。学员们在窑洞前和山坡上开荒种地，浇水施肥，大多数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三部的学员要完成规定纺棉纱、纺毛线、织毛衣的任务。

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是发展校办经济的骨干力量。他们参加劳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职人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义务劳动，一种是到生产单位从事专业生产。我当时也要跟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养猪、放羊、种菜或参加校农场、菜园的劳动。

中央党校的生产劳动所得，使大家的伙食一步步得到改善，增强了学员体质，保证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1943年已经做到每人每天食油7钱，豆腐3两，饭菜不定量，常年有肉食。1944年做到了每餐四菜一汤，冬天每桌还有一只火锅。同时，中央党校的大生产也为边区政府积累了大量资金。1944年底，全校生产细粮已达12000石，全校全年生产收入已占全校经费开支总额的74.6%，到1945年秋天的时候，中央党校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此外，在此过程中，中央党校还培养了一批理财能手和经济管理干部，也使许多学员和工作人员掌握了不少生产知识和生产自救的本领，涌现出一批养猪能手、种菜能手、烹调能手、纺线能手等。

值得一提的是，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还保障了七大代表们的学习和生活需要。七大自发出会议通知到会议结束，前后长达六年时间。由于党组织分散在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从选举代表到启程来延安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到延安以后又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于是中央党校就成了七大代表们吃、住、学习、开会、办事最好的地方。

从1941年底开始，出席七大的代表陆续入住中央党校，编为十几个支部。我记得，中央党校在彭真的指示下，成立了专门班子，做了充分的准备，保证代表们住好、吃好、学习

好、开会方便、用品及时供应。代表们顿顿吃得上猪、羊肉，每人都有冬夏衣服、鞋袜，能抽上“海燕”牌香烟，牙刷能以旧换新，每人发两个笔记本。牟泽衍还让黄立德率领的蔬菜生产大队，扩大种菜面积，大种茴子白、西红柿、黄瓜、韭菜、油菜等，保证代表们一天三顿都能吃到充足的新鲜蔬菜，一周能吃两次馒头、一次面条。代表们所住的窑洞也被粉刷一新。七大代表们大多从敌后战地或国统区地下工作环境中来，一入中央党校，见吃、穿、住、用都安排得这样周到，皆大欢喜，不少人都说：“我们来开‘七大’，还享福哩！”

##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为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1942年4月，彭真在礼堂主持召开了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会后，中央党校把中央划给学校的胜利食堂改建为俱乐部，购置了一些文娱器材，如扑克、象棋、麻将、军旗、乒乓球等。俱乐部办得红红火火。在俱乐部组织下，成立了京剧班、合唱团、器乐组、文学组，还有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等。另外还组建了大秧歌队，春节期间，到杨家岭向党中央拜年。党校45班的作家蔡天心，建立了文艺创作组，参加者十几个人，我也参加了，编了几期油印刊物和手抄

的文艺壁报。1943年中央党校又将原来的一个小操场扩建为一个运动场，设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单双杠、木马等。各项文体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每天傍晚，在俱乐部和校园内，学京剧的、打排球的、练器乐的、下棋的、打乒乓球的……歌声四扬，活跃异常。在开阔的运动场上，打球的、比赛的，十分热闹。每到周末，俱乐部里必有舞会，教舞的、跳舞的，人满为患。

毛泽东爱看京剧、话剧，也爱跳舞，周末往往到俱乐部来玩，同时与学员们接触，随时了解一些情况。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艺学员学习后，文艺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深入群众，创作了许多新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戏剧系排演了歌剧《白毛女》，到中央党校首演，连演了一个月，引起极大轰动。但一些老红军提意见，说像黄世仁这种人，早是地主恶霸了，为何不枪毙？！彭真也同意这个看法。鲁艺随即作了修改。接着，他们又来中央党校演出了德国作家写的四幕话剧《马门教授》以及苏联剧作家高涅楚克创作的著名话剧《前线》。彭真在讲话中多次赞扬了《前线》中的军事改革家欧格涅夫少将，并说保守派将领戈尔洛夫就是该淘汰。之后，鲁艺来中央党校演出了多幕话剧《周子山》。平剧院来中央党校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征求

意见后都作了修改。在新年、春节期间，鲁艺大秧歌队到中央党校（也到其他单位）进行汇报演出，《兄妹开荒》、《欢庆新春》、《法西斯丧钟敲响了》等秧歌剧、活报剧，大受学员们的欢迎。最后，人们跟随鲁艺大秧歌队也扭起大秧歌，皆大欢喜，迎接新年的到来。

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刘芝明，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话剧、京剧、曲艺领域都是内行。1943年下半年，党校的齐燕铭、杨绍萱创作了京剧剧本《逼上梁山》，以《水浒》为蓝本，描写的是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一批梁山好汉起义，反对高俅等封建反动阶级的统治。刘芝明审查通过后，即由平剧院排演。演员不够，就从党校学员、职工中遴选，如主角林冲，由三部俱乐部主任金紫光饰演，鲁智深由二部学员、河北京剧名角王珮英扮演，林娘子由党校的女职工陆平扮演。彭真看了彩排后，拍板通过，决定正式演出，请毛泽东和有关领导一起来看。1944年1月9日晚，《逼上梁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正式演出。果然盛况空前，诺大的礼堂里坐满了学员，窗台上都坐满了，两侧走廊里也站满了，不下一千二三百人。演出过程中，全场气氛热烈，观众们随着剧情的发展，时而欢笑，时而愤怒，时而叫好声不绝于耳。演出在戏剧的高潮中结束，全场起立鼓掌长达十几分钟。毛泽东和中央书记





中央党校学员们的课余生活

处的领导们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泽东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连夜写了贺信。第二天清早，我起床走出党校门到延河边跑步，收发室老王喊住我，将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一看，是毛泽东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

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我拿了这封信去告诉彭真，然后想转送杨绍萱、齐燕铭。彭真看完信后，说：“小陈，你不忙送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看，先贴在山下布告栏里，让全校教职工和学员看看，高

兴高兴，受一次旧剧改革的教育。”学员们看了信，议论纷纷，都说毛主席的文艺水平就是高。

由于中央党校在戏剧革命中起了开端作用，1944年2月，中央决定把延安平剧院并入中央党校。4月，毛泽东、彭真决定由刘芝明兼任院长。

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前后学习、工作了四年半时间，亲眼目睹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央党校的关怀和指导。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延安中央党校不仅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保存骨干、教育骨干的任务，而且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思想库，以数千名干部的集体智慧，完成了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未来方略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让彭真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城市工作部部长。他将延安中央党校一、二、三部学习的晋察冀干部七八十人调回前方工作。随后，又从中央党校校部和六个部中，将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各个城市、县的干部派回原籍去，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建立地下军队，配合我军反攻，里应外合，不下几千人。延安干部经过整风，都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除个别干部思想动摇外，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服从派遣，在抗日反攻、接管城市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被调入中央青委副书记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工作队”，挺进东北做青年工作。

（责任编辑 陈小丽）